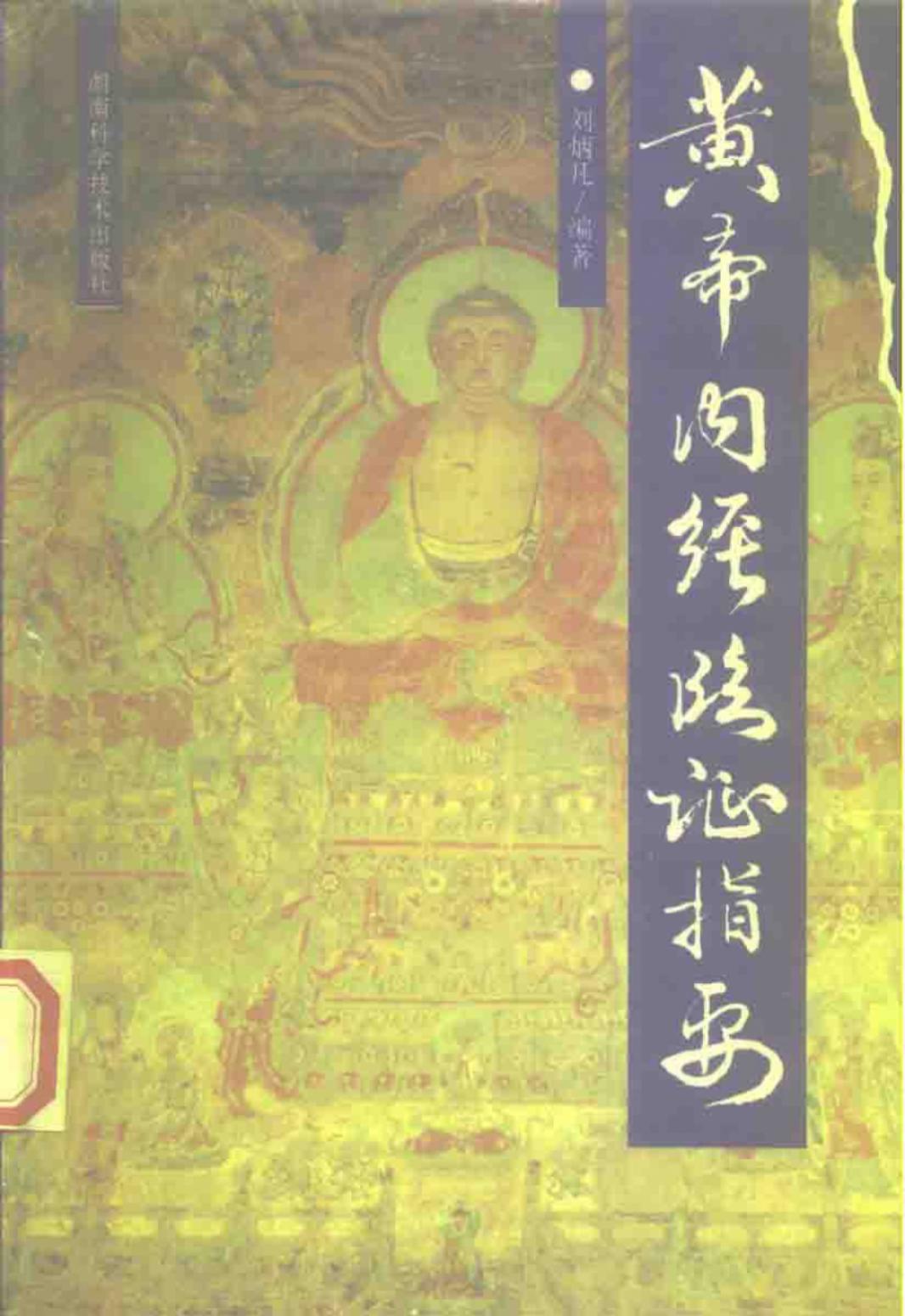


刘炳凡 编著

董希向经疏指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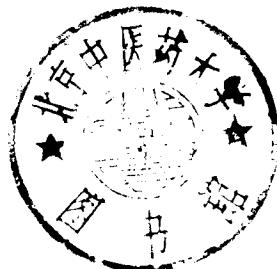


河南竹子技术出版社

黄帝内经临证指要

● 刘炳凡 / 编著

●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0113175

00592101

黃帝內經臨證指要

编 著：刘炳凡

责任编辑：黄一九

出版发行：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社 址：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

印 刷：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

厂 址：长沙市芙蓉北路 564 号

邮 码：410008

(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)

经 销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出版日期：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

开 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：16.5

插 页：4

字 数：314000

印 数：1—3000

征订期号：地科 235—2

书 号：ISBN 7—5357—2273—3/R·453

定 价：26.00 元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

作者近影

刘炳凡研究员小传

刘炳凡，男，汉族，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（今汨罗市）。中共党员，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，学术顾问。

刘炳凡同志从事中医药临床、教学、科研工作66年，早在50年代及60年代，就从事晚期血吸虫病研究，从实践中总结出晚期血吸虫病腹水辨证论治的经验；70年代从事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研究，创造性地使用蛞蝓、鼠妇治疗上腭混合瘤及喉癌，并总结出对肿瘤辨证论治的规律；80年代初主持“抗衰延寿”课题的研究，根据马王堆医书《养生方》，研究出“古汉养生精”。在医疗实践中，强调“治病必须治人”的整体观，否定见病不见人的片面性，以惩时弊；临证用药尤重调护脾胃，总结出归经汤、蛭桂散、三藤汤、三参首乌汤等临床药方，扶正驱邪，本末兼顾而无后患之虞。在教学方面，培养了硕士生10余名，学术继承人2名，现均成为单位技术骨干。此外，1985年兼任光明中医函授大学湖南分校校长，在此期间，毕业学员共计1234名，加强了基层中医技术力量。其主要著作有：《脾胃论注释》（执笔卷下），《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》（执笔刘河间、朱丹溪），编著《脾胃学真诠》，主编《湖南省老中医医案选》一、二、三集，高等中医函授教材《中医儿科学》，发表论文50余

篇。

刘炳凡同志是中共湖南省第五届党代会代表，湖南省第四、五届人大代表；一、二届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，湖南省科研系列高评委员会委员。1959年获卫生部奖状，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，1984年参加湖南省劳动模范观礼团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，受到中央领导接见，1986年获卫生部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，1987年获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。1989年获湖南省劳动模范称号，1990年载入《中国人物年鉴》，1991年载入《中国当代自然科学人物总传》，1991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，1994年湖南省人事厅授予三等功，1996年获首届湖南科技之星的称号，1997年荣获湖南省“白求恩奖章”。

刘炳凡同志年已八十有七，求医求教者日多，然不厌不倦之精神发出似无尽藏的光辉以吸引后进、关怀患者，《内经》中所谓“至人”其人之俦欤！抑中医医学中真能现身说法者欤！

序

《内经》为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之合称。《素问》之诠释，自唐·王冰次注以降，盛于明、清，亡佚者外尚余十数家（据《素问识》存 17 种）。《灵枢》一称《针经》，详于经络水穴，与《素问》文气有异，注者盖孤，现存不足十种（据《灵枢识》存 9 种，专注仅 2 种）。合《素》、《灵》类纂而盛行于今者，为张景岳之《类经》，李士材之《知要》，汪讷庵之《类纂》，各著皆自成体系。凡此类纂，毋论简备，均详于理法而略于方药，于学术与临床上尚有距离。夫医者之务，非仅探索天人性命而已，尚肩负防治之责，其于临证辨析、遣方用药，均有微末必别者在，未可如言者之用微知著、一言以终也。况时世相移，习俗气化之变乎！盖有待于研究古学而致实用、列出新方而收时效者，此继承创新形势之所需求也。炳凡先生湖南名医，星沙耆宿，自临床而登讲席，由实践而治学术，有鉴于《内经》之论备而方少，业医者循证而需方，遂以八秩眉寿，前后积十五稔辛劳，出研究《内》、《难》、《伤寒》五十餘之心得，著《黄帝内经临证指要》一书。此书据证列方，炼补天之石，辨机布药，备诠古之阙，间或附以实例，采风于民间，叙及新学，旁引乎兵法，赅计纂分上下二篇。上篇为中医基础《灵素通义》，引用古今名方 120 首。下篇为中医临床，《类证

古今精述等 120 首，合注而为佳。

系方》42类、362条按病、证、症，均系以古今名方及其治验，合计287首（含异病同治方不重出）。使方随证见，法循机变，其嘉惠时师后学者概可见矣。完稿后两承邮示，索余为他山之石。余自顾末学疏陋，岂敢便言！第忘年谊重，难负雅命，故欣然命笔，叙所知所见者如此。

丁丑清明巫君玉在京寓瓣杏斋

前　言

《黄帝内经》(含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)共十八卷，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总结。它的哲学思想源于《周易》“自强不息”的天人观，立体太极图表现事物的阴阳动态平衡观，其中对宇宙运动变化规律讲述得最为深入。正如唐·王太仆所云：“其文简，其意博，其理奥，其趣深”。为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。因此，近人誉之为“东方传统生命科学”。

爱因斯坦说：“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的理论，没有认识论作依据，是站不住脚的。”“道经千载更光辉”，诚非虚语。《黄帝内经》立言的指导思想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，具有“通贯三才，包罗万象”的多学科知识。“云奔雨府，霞拥朝阳”、“松吟高山，虎啸岩岫”，此其气象之说也。“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”，此其人与自然之学也。“善言天者，必应于人；善言古者，必验于今；善言气者，必彰于物。”此其宇宙观也。“阴精所奉其人寿，阳精所降其人夭”，“出入废则神机化灭，升降息则气立孤危”，此其生命之学也。“数之可十，推之可百，数之可千，推之可万”，此其数理之学也。“阴气者，静则神藏，躁则消亡”，“阳气者，精则养神，柔则养筋”，此其病理生理阴阳变化之学也。“不治已病治未病”，此其预防思想之学也。“法于阴阳，和于术数”，“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”，“治病必求于本”，“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，以平为期”，此其临证治疗之学也。其体大，其思深，以脏腑和病机学说，为其理论核心。以阴阳五行学说，为其方法论体系。内容丰富多采。故后人又称之为“古代百科全书”。“知

其要者，皆足以赞化育而寿斯民；和缓得之，明造化，别死生；扁仓得之，著《难经》，立《诊籍》；仲景撰用为《伤寒杂病论》；元化师意以传《中藏经》；皇甫谧述九针，明甲乙；孙思邈治五脏、重养生。唐宋注经，弘扬其旨；金元祖述，实践其言；迨至明清，张皇幽渺。景岳类经，科条斯理；隐庵集注，众义折衷。士材知要而不繁，生白原旨而不紊。此皆由博返约以洗炼见长。

余治学《内经》五十多年，以应教学之需，珠联《灵》、《素》，分类综析；因读河间所阐发病机十九条，极深研机，而加以补充，冀对后之学者有所启迪；因思《内经》治则最有益于临床，核之孙子兵法，以正合以奇胜，未尝不同，乃为之裒集经文，辄引兵家学术思想以证之，所谓“用药如用兵也”。

近代秦伯未氏以医学名家，旨在指导临床，选编《内经类证》，而余瀛鳌氏重订，印证病机，颇切实用，虽有证无方，但“执柯伐柯，其则不远”。

历代医家踵事增华者有之，校勘精审者亦有之，窃以为畅发其旨，似有未尽之处，因不揣浅陋，重整旧编，博采众长，约其旨趣，颜之曰《黄帝内经临证指要》正在于“唯变所适”而患其执中无权也。本书从天人相应，整体揆度着眼，首揭灵素通义，以寻求其理论体系；次为类证系方，以探索其指导临证的用药规律。尽量吸收前人成果，取精用宏，勒为二篇。上篇是基础，下篇是临床。期与同学切磋，亦以就正大雅。但学无止境，本书岂敢诩为定稿，以我有生之年，皆为修改之日。谨志数语，以示拳拳。

本书由刘光宪通校，谭英协助之；承邓铁涛、巫君玉、刘祖贻、李致重、朱文锋诸位教授评审，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，并承湖南省科委、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党委、湖南科技出版社大力支持出版。特此致谢！

刘炳凡

1997年9月 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

说 明

一、本书精选《黄帝内经》原文，以常见习用的自然段为主。段落之间脉络分明，体现其内部联系，俾于涵泳中得以类比研证。章节间加以概括性的小标题，以范围其内容。

二、本书上篇《灵素通义》列摄生、阴阳、五行、藏象、经络、诊法、病机、治则八章，属于精简的基础理论，为临床各科的重要载体。下篇《类证系方》，凡 42 类（含内、妇、五官、外科），其《内经》原文选择的依据是，以现代常见多发的病证（含疑难杂症）为主。在系方上选用《内经》有关病、证、症的原文，是经过历代医家根据经旨反复验证，信而有征的。凡古有今无者概不引入，其原文的名家注释和论述，均采取说明经旨，阐明其学术思想而切于实用者为指归。类证以溯其源，系方以畅其流。为了不失经旨，针对临床现实，勤搜博绍，广采古今名方，特别是未传之秘，如“蚁狮膏”、“骨髓丹”之类，具有古方新用者，特表而出之，以备采风焉。

三、本书上下篇，每章、每类之前均有小序以提其纲，之后均有结语以总其成。以明其学术渊源和事物发展之前景。书后附录、方剂索引和主要参考文献，以资印证。

四、经文古奥，一般学者难于领会贯通，搜集古今研究《内经》的名家 956 人次，详其训诂，明其句读，重在以实践证其言，约其辞旨，期于信雅达。

五、注释引文首重出处、姓氏之外，附以书名，但只列于初

见姓氏之首，其后从略以省篇幅。

六、明理之谓学，实践之谓用。本书上篇重在求知以明理；下篇重在实践以致用，根据经旨系古今反复验证的名方 287 首，引用古今名方 120 首，或一病多方，或一方多病。然而理论与实践不是绝然分开的，但应明确“行”是“知”的来源，古今实践概莫能外。这就是“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。”

七、富于辩证思维的中医传统著作，应是坚持继承不泥古，发扬不离宗的原则的。基于此原则，笔者将太深奥看不懂的文字于章节后加凡按、或于文章节段之中括弧内加按、或于引文煞句之尾加按，以示区别文字的脉络界线。按语融会诸家之精华，作浅述的表达，并力求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趣味性。

八、原文注释或有或无，名家论述以及凡按或详或略，此非遗漏，而是注释、论述及按语之间互文见义，以免重复。

绪 论

凡我中华儿女莫非炎黄子孙。班固在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称“炎帝神农”以姜水成，生而异德，故以姜为姓。始作耒耜，教民耕种，号神农。自西徂东，“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，尝百草，始有医药”（《补史记·三皇本纪》）。《史记·三皇本纪》：“神农氏葬长沙”。《路史》：“神农盖宇于沙，是为长沙。崩葬长沙茶乡之尾，是曰茶陵”，即今炎陵县之炎陵山。至今有味草亭、捣药石、洗药池之遗迹存焉。

刘恕《通鉴外纪》：“民有疾病，未知药石，炎帝始尝草木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尝一日而遇七十毒，神而化之……以疗民疾，而医道立矣。”陶懋炳《中国古代史学史略》云：“远古传说中所颂扬的英雄人物，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主宰，而是居于群众之中，与他们同甘苦，共患难的领袖人物”。其日遇七十毒，应是上行下效，尝之者众，故云，其神而化之即解毒措施也。

以上诸传说，说明当时劳动人民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，已发现若干植物有催吐或泻下的作用，为天然植物药治病的嚆矢。

据史料记载：黄帝以姬水成，故姓姬，号有熊氏，名轩辕。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。他与先民们一道，制弓箭，造舟楫，教桑植，做衣裳，定算数，研医药，创音律，发明指南针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太古有岐伯、俞跗，中古有扁鹊、和、缓，盖论病以及国，原诊以知政。”今称岐黄为医家之祖，岐是岐伯，黄是黄帝。黄帝陵在陕西省中北部。黄土高原的万山丛岭中，有

沮水环抱，古柏簇拥的奇特山峰，黄帝陵就坐落在高峻如桥的桥山之巅，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景仰的胜地。庙院后有大殿，门眉上高悬“人文始祖”金字匾，为程潜先生手迹。1937年，抗日烽火连天，国共两党同祭黄陵，毛泽东同志亲撰祭文曰：“赫赫始祖，吾华肇造；胄衍祀绵，岳峨河浩。聪明睿智，光被遐荒；建此伟业，雄立东方……”。高度概括了黄帝的历史功勋。

据历史考证：神农在前，属于母系氏族社会；黄帝在后，属于父系氏族社会。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炎黄文化。诸如于刀耕火种的生产实践中，关心民瘼，发明了灸、针刺（骨针）、导引、按摩、药熨等外治医疗技术，逐渐发明和发展了汤液醪醴等内服汤药。在攻战过程中，从匚（含甲）、殳（兵戈）、巫（符咒）、酉（酒醴）中，制造了象形的“醫”、“醫”字。

炎黄开创医药为民疗疾，带动了民间医药的兴起。如《诗经》“采茅芭以避产难”。《书经》“若药不瞑眩则厥疾不瘳”（已认识有毒之药的疗效）。《礼记》：“医不三世不服其药”（重视传统经验）。《周礼》，医学分为四科：“食医、疾医、疡医、兽医”。说明医药的发展，是从无到有，从简单到复杂，从低级到高级的。首先是识识相因，口传心授。至春秋战国，铁器盛行才有条件著于竹简木牍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幸医农之书未遭秦火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：“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。”西汉时期已有此书。但究竟成书于何时，尚未定论。

《黄帝内经》为什么称“黃帝”呢？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云：“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，故为道者，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。”著书立说必高远其所从来。如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，大概都是这类托古尊圣之作（张岱年《中国唯物论史》）。近代恽铁樵说：“今日之《内经》中有春秋之前的文字，有战国时人、西汉时人的文字，故其古者甚古，如《太始天元册文》‘太虚寥廓，肇基化元’等十四句，绝类《阴符经》、老子《道德经》。《内经》中类此之文字，皆饶有古意，所当深思潜玩者”（《群经见智录》）。

说明托古的本身是轩岐事业继继绳绳的有道者实践经验的升华，实具有自我流传的学术价值。从春秋、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以来，医药学术的成就隐者多、显者少。如七篇大论，应是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原文，乃因“师氏藏之”，故至唐·王冰见到的张公秘本“文字昭析，义理环周”。这是《内经》的“伏流”（见陈桥驿《水经注江河伏流的研究》）。古人确有非其人不传的传统。如仲景《伤寒论》，华佗见之曰：“此真活人书也”。孙思邈曰：“江南师秘而不传”（《千金冀方》）。

因而《黄帝内经》成书之年上限至春秋末，战国初，下限至西汉。元·吕复云：“观其旨趣，非一时之书，其所撰述，亦非一人之手”。而王冰次注《素问》和其从“伏流”中发现《运气七篇》，乃古人之笔，非唐人之笔也。近人赵璞珊《中国古代医学》说：《黄帝内经》包括《素问》和《灵枢》都是秦汉时代成书。此与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文物对照，是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。

《黄帝内经》在历代的科学实践中，总结出一套唯物的中医认识论是很有价值的（《中国唯物论史》）。故注其书者如林，如南朝·梁全元起、隋·杨上善、唐·王冰、宋·林亿、元·滑伯仁、明·张景岳、清·张志聪等，都重在理论内涵的注解和发挥，以体现尊经重道，述而不作之旨。但从历代医家运用《内经》理论的学术思想指导实践，其临床疗效，如响之应声，愈病就是科学，是信而有征的。

然而《内经》本身，理法备而方药不全者，实由于私有制的制约。如《史记》载：“扁鹊遇长桑君，扁鹊独奇之，常谨遇之。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。出入十余年，乃呼扁鹊私坐，闲与语曰：‘我有禁方，年老，欲传与公，公毋泄。’”得效之方，秘而不宣，此《内经》有论无方之通例也。尽管如此，仍系有十三方：1. 乌贼骨丸，四乌贼一茴茹，丸以雀卵，治“气竭肝伤，血枯经闭”；2. 半夏秫米汤，治胃不和卧不安，“阴阳已通，其卧立至”；3. 泽术麋衔汤，治“身热懈堕，汗出如浴，恶风少气”，“名曰酒风”；4. 兰草汤（单味），治“脾瘅”、“口甘”，“此人必数食甘美

而多肥……转为消渴”，“治之以兰，除陈气也”；5. 生铁落饮，治“阳厥”、狂怒，“服生铁落者，下气疾也”；6. 菱翘饮（菱角、连翘），治“痈发于胁，名曰败疵”；7. 猪膏，治“痈发于嗌中，名曰猛疽”。猪膏（猪脂）冷服能清热泻脓；8. 马膏膏法，治“颊筋（面神经）有寒则急，引颊移口，有热则颊弛纵，缓不胜收，故僻（口眼歪斜），治之以马膏，膏其急者，以白酒和桂，涂其缓者……”；9. 小金丹（雄黄雌黄紫金），“每服一丸，服十粒，无疫干也”；10. 左角发酒（即血余炭酒），治“五络俱绝，令人身脉皆动，其状如尸”；11. 鸡矢醴，治“旦食则不能暮食”的“鼓胀”；12. 寒痹熨法，治“寒痹之为病，留而不去，时痛而痹不仁”，熨之姜桂椒酒，“令热至于病所”。其汤液醪醴，《内经》备而不用，景岳《类经》未载，故阙如。

上述十三方，有病、证、症三种不同情况，依其分类有植物、动物、矿物，其剂型有丸、散、膏、丹、汤、饮、酒、醴；有内服也有外用，有用于治疗，也有用于预防。虽然方药很少，但类别、剂型等都较全面，给后世方剂学和炮制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然而，金·张元素说：“运气不齐，古今异轨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”（《金史·本传》）。即不可以一成不变的古方，去治疗因人而变的新病，与朱丹溪“拆旧屋，接（建）新屋”同一见解。不然的话，元素所著《医学启源》在六气通治中就有至宝丹，暑热中就有桂苓甘露饮等古方。他本人又新制了九味羌活汤、枳术丸等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，同样也是“古方新病，甚不相宜”，关键在于用方之化裁也。语云：“对病真方”，何分今古。“用方以活变为主”，“使方而不便于方也”（《先哲医话》）。所以，《内经》十三方中有“四乌贼一茴茹丸、半夏秫米汤、兰草汤（大泽兰）、泽术麋衔汤（鹿衔草）、铁落饮、鸡矢醴（雄鸡矢白）、马膏（今人以鱠鱼血、蓖麻子代）、寒痹熨法等。至今均为今人加减沿用。

嗣后，金·刘完素在其所著《宣明论方》，据《内经》病证补61方。但所补之方多是“方证对应”而非治病治人的整体调节。这

也是受当时《局方》的影响。

至近代，秦伯未始有《内经类证》之辑，为《内经类证系方》提供了宝贵的依据。余受此启发，因忆先师柳公缙庭临终遗言：“欲为苍生大医，要恪遵司马迁‘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’，以‘学、问、思、辨、笃行之’无余蕴矣！”再拜受教作为终身奋斗目标。以后临证不忘读书，读书不忘临证。乃勤研医经、医史，特别是历代名家引用《内经》经旨治疗各类疾病的临床医案，在辨证论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，拳拳服膺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“集众思，广忠益”，宜身体而力行之。用50多年的经验累积，因有《内经类证系方》之撰。但不是“无源之水，无根之木”，《内经》的基础理论很重要，它是《类证系方》的前提。因而本书的上篇，含摄生、阴阳、五行、藏象、经络、诊法、病机、治则等为系方的载体，并引方120例。王冰序《素问》云：“将升岱岳，非径奚（怎么）为，欲诣扶桑，无舟莫适（往去）”。正是基础为临床根基的鲜明写照。

但兹事体大，绝非一时之成，一人之获所能毕其功于一役。余乃历15春秋，从教、研、临工作中搜集古今医家运用《内经》经旨于临床，获有实效之方，并结合本人心得体会，验证其方无讹，乃分列于《内经类证》362条下，按病、证、症的不同情况，而辨证系之。还其方药论治的“伏流”面目，计系古今名方287首，可谓于有论少方之《内经》发明经旨于万一也。这些千锤的方药，亦即古今医家学习《内经》和其他经典以及各家学说取精用闳的真实反馈。正如邓铁涛氏说：“《内经》蕴藏着强劲的生命力，时过2000年而不减其学术光辉”（邓铁涛医集）。诚非虚语。

然而比较起来，系方易而用方难。有同病异治，异病同治之方，有一方多用，一病多方之方。近来学者作了一个相关的阐明，认为中医的研究对象，居于器官、组织、细胞、分子水平微观之上，介于人与自然、社会宏观之间，具有：1. 整体观；2. 非特异性；3. 动态性；4. 信息性。中医研究方法的特点是：1. 综合性；2. 非还原性。这些论点，是符合《医》《易》相通的“变动不居”，